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 *

On Qian Zhongshu's Concep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罗选民
LUO Xuanmin

摘要:

钱锺书基于翻译实践，总结出“化境”这一文学翻译观。“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文章通过分析得出，“化境”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诱”“媒”“讹”“化”道出了译之功能，译之本质和译之理想。需要注意的是，把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运用到一切的翻译实践中是不妥的。

关键词:

钱锺书；文学翻译；“化境”论

Abstract:

Based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Qian Zhongshu summarizes *huajing*, or sublimation, as his concep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or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stead, sublimation should be seen from the concept of wholeness by connecting i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rough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 of sublimation is part and parcel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in which “enticing”, “matchmaking”, “miswording” and “perfecting” manifest the function, the nature and the goal of translation. It should also be noticed that these concepts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literary translation; *huajing*, or sublimation

*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的传播与评价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AYY001）之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钱锺书¹的“化境”论在我国译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译界对钱锺书所著译论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每年都有不少相关文章刊出。目前译界对于钱锺书的翻译观也存在着不同理解，特别是针对“化境”一说，存在各种解读，众说纷纭：有褒扬其美学价值，有批评其神秘虚无，有探寻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者，还有人将其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而对其进行现代性的阐释与转化。钱先生这个看似简单的“化”字，实则意蕴深远。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化境”，就不能将“化境”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具体语境相割裂，更不能将“化境”与钱锺书先生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相隔离。本文拟从整体观的角度重新解读钱锺书先生从“信”到“不隔”再到“化境”的有扬有弃、与中国文论一脉相传的文学翻译观。

2. 钱锺书的翻译实践

2006年，我曾拜访杨绛先生，提到想设立一个“钱锺书翻译奖”。然而杨先生的回答却是：钱先生不做翻译。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成为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确很难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钱锺书署名的译著。但是，如果钱锺书不做翻译，他有关翻译的论述就难以让人信服。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聂友军曾在《中国比较文学》上撰文“钱锺书翻译实践论”，但译例分析局限于钱锺书的学术论著《管锥编》，主要对其中一些散论的翻译抑或成语的翻译做了分析（参见聂友军 2008：33-46）。如果拿这个来证明钱锺书做过翻译实践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为此，笔者进行了调研，搜索了有关资料，发现钱先生是做过不少翻译实践的。

首先，众所周知，钱锺书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1950年8月钱锺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参见吴学昭 2008：251-25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灌注了钱先生的大量心血。据统计，钱锺书负责的翻译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钱锺书负责审校的文章有：《湖南农民问题考察报告》《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与任务》《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等（王冰 2002：7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个特定的时代，翻译伟大领袖的选集就好像翻译《圣经》一样——领袖话语的翻译必须有一个权威的版本，但翻译时对原文意义的最终阐释，译文的定稿却往往并不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事情。翻译《毛泽东选集》这种政治性较强的著作在当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一般都是集体翻译、集体

定稿。笔者曾经作为专家被邀参加了北京市政府有关“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的翻译定稿的讨论：“创新”该翻译成“creativity”还是“innovation”？“厚德”该翻译成“virtue”还是“moral”？虽然一共只有八个字，翻译起来却并非易事，近二十名专家一块讨论了一下午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难怪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参见严复 1984：136），此时感受尤深。翻译是经国之伟业一说并非夸张，它容不得半点的闪失，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形象的翻译，更得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才能把它做好。

后来成立的《毛泽东诗词》定稿小组也一样，都是由多人组成，翻译历时很长，钱锺书也是该定稿小组的成员之一。据叶君健的回忆，1960年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袁水拍为组长，成员就有乔冠华、叶君健、钱锺书，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叶君健和钱锺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叶君健 1991：7）。该译本最终于1976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来也成了外文出版社出版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可见钱锺书先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为了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了很多的翻译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因为集体作业的缘故，他的业绩、他的名字不为人晓。

当然，钱锺书还是有一些发表于各期刊与报纸上的译作。其中比较完整的译文包括海因立许·海涅的《精印本〈堂·吉珂德〉引言》²，左拉于1870年5月13日刊登在《号召报》的一篇小短文《关于巴尔扎克》³等。1962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也刊登了钱锺书先生摘译的《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⁴。1979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其上编中的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和刘若端选译；下编中西欧及美国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和杨绛选译。

此外，如果我们再梳理那些散见于钱锺书学术著作中的英、法、德、意等诸多外文引语的翻译，那一定是蔚为奇观的。比如，钱氏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一千多个作家超过一千七百条的名言警句，涉及英、法、德、意大利、拉丁和西班牙语在内的六种语言，基本都是用文言文翻译，地道的文言文几乎让读者分辨不出哪些地方是根据外文原著译来的。最后，除了自己翻译，钱锺书还帮人校对译稿，比如杨绛先生翻译的《吉尔·布拉斯》，杨必翻译的《剥削世家》都是由他帮忙校稿的。

钱锺书到底做不做翻译？我想还有其本人的说辞可作为依据：根据罗新璋的回忆，他在拜访钱锺书先生时说自己在外文局搞了十七年翻译，结果走得还不愉快；钱先生回答说，他也搞了十七年翻译（指“文革”前十七年）（转引自金圣华 2002：107）。然而，仔细深思杨绛先生所说的钱锺书不做翻译，我想杨先生是用高

标准来衡量的。她认为做翻译的学人，应该是译作等身，把自己大量的时间都投在文学翻译之上。我想这些的确是钱锺书所不具备的。他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做翻译，除了服从组织分配翻译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他基本是按组织的需要而做翻译，再就是因理论需要而做译介，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需要引用，因此，他的翻译总的来说是编译和摘译比较多。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被学界作为经典来阅读，这也绝不是偶然。钱先生的译文和他的译论一样零散，却值得我们好好整理和研究。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说的那样，钱氏的译论与译文，以少胜多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举一反三（参见罗新璋 2013：80）。

3. 有关钱锺书文学翻译观之分歧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主题为钱锺书翻译的文章有 148 篇，其译论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学界对钱锺书先生的译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上，而对该文的讨论大都停留在“化境”说之上。然而，译界对“化境”的理解一直都是见仁见智，各种解读，众说纷纭。首先，“化境”到底是翻译时应该遵守的标准还是翻译中不可企及的理想？有学者将“化境”看成是翻译必须遵循的标准，比如谭建香、唐述宗（2010）认为将“化境”定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化境”说只能是继“信、达、雅”之后的又一新的翻译标准。有学者认为“化境”并不能作为翻译的标准，比如陈福康（2000：419）认为“化”虽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和原则。蔡新乐（2001）警告“不能盲目地接受钱锺书的‘化境’思想”，“化境”论只能是“愿望的自我欺骗”，是“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否定”。黄汉平（2003：28）更是指出很多人中了钱先生“障眼法”的圈套，其实“化境”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想钱先生早在 1985 年就给予了答案——那年，钱先生在修订《林纾的翻译》一文时，就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中的“标准”两字换成了“理想”，而且文中也一再强调了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学界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化境”与传统译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化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延续，有学者却认定“化境”实际上是对传统“忠信”论的反叛。罗新璋先生在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就将我国传统的翻译思想归结为“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认为“化”既是对“信达雅”的一个突破，更是对“译事三难”馀绪的一种发展，因而认定“化境”是传统译论的一部分（罗新璋 2013：49）；冯世则（2001）也通过解读钱锺书《译事三难》一文，认定钱锺书对严说虽持异议但仍同意“信”为翻译的唯一原则；朱志瑜（2001）

也撰文回顾了由傅雷和钱锺书分别提出的“神似”和“化境”之说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将傅、钱两人之说合称为“神话”说。然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此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郑海凌（2001）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说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从而修正了传统译论中“求信”的美学原则；张佩瑶（2009：28）也认为钱先生的说法蕴藏着无穷的话语能量，甚至可以用来推翻基于忠信的翻译观，但较好的做法是把他的思想中无穷的能量释放出来，视他的文章为一种对忠信以外翻译观的肯定，从而拓展翻译的概念。崔永禄（2006：48）认为钱先生虽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但却发现它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现实翻译中充满了和原文的背离，这就足以使忠实原文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译论出现断裂。

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将钱锺书的化境与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对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转化。有学者将钱氏翻译观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如奈达相提并论，认为“化境”说与奈达的“动态对等”虽处于不同时期，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朱宏清 2001）；也有不少学者将钱锺书的译学理论与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海德格尔等学说相结合（黄汉平 2003；蔡新乐 2005），认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黄汉平甚至还认为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阐发的翻译思想与当代“多元系统论”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还有学者将钱先生的“化境”等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归化”（崔永禄 2006；葛中俊 2012）。

“化境”到底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可以肯定的是钱锺书在写《译事三难》时至少对“信”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其之前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却用“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来为林纾的漏译误译开脱，甚至赞扬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称林译“讹”中最具特色的成分正是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那么是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前后矛盾，还是他对“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他的“化境”论是反对“信”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在其后的《译事三难》中又肯定了“信”的原则。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只能返回文本的语境中，从钱锺书的有关翻译论述着手，从整体观的角度来审视钱锺书先生的文学翻译观，从钱先生自己的论述中寻找答案。因此，对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考察，不但要注意该文章写作的背景与动机，还应考虑该文与钱先生其他译论的关系，既要考虑钱先生的世界性的视野，又要考虑其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不能简单地否认传统的因素，更不宜将他的翻译理论与外国理论捆绑在一起。

如钱锺书和德里达都坚持翻译无法替代原作，但它独立存在，它与原作的关

系是互补关系,而非依附关系。本雅明,德曼等以“后起的生命”来比喻译作,而钱锺书借佛教语以“投胎转世”来形容译作,两者何其相似。但解构主义强调文字的“延异”,因为延异将无限的持续,故翻译的忠实性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显然与解构主义分道扬镳。虽然钱锺书不承认绝对的忠实,但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译作依原文“义旨”与“风格”来得以传递被看作是“信”的必要条件。

4. 文学翻译观之整体解读

钱锺书有关翻译讨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译论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其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1934年发表在《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论不隔》;1934年发表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家》(*The Chinese Critic*)第七期的“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⁵;1948年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的英文文章“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⁶;1948年发表的《谈艺录》上不止一次谈到翻译问题;1964年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的《论林纾的翻译》⁷;1979年《管锥编》出版,书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此外,钱锺书对翻译的灼见还出现在其诗和诗序之中。钱锺书虽然没有以鸿篇巨制来探讨翻译,但他对于翻译的重大问题都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学贯中西的他表现出一种深锐的洞察力,睿智而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思想。因此,钱的翻译观虽有西方学说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既有传统的继承和扬弃。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典籍《说文解字》开始谈起的——翻译之“讹”就可追溯到佛经翻译时道安的“五失本”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失本成译”,认为“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他所提出的翻译的“媒、诱”功能,也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所说的“通、达”说相通;甚至“化境”说也是从“信”与“不隔”一脉相承发展而来。

4.1 从“信”、“不隔”到“化”:译之理想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开篇,钱锺书就从清代文字学者许慎的一段训诂出发,汲取中国古代哲学之“化”的精髓,借鉴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论中的意境和境界概念,精辟入理、高屋建瓴地道出,“化”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该文是钱锺书有关翻译论述的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论文,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境界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概念,王国维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曾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与其深浅而已。”(王国维 2011: 44)在文学艺术中,境界非客观可见的物或环境,而是彻觉彻悟并且凝练于心的某种品质,这

种品质必须通过直感与反复揣摩方能达到。“化”的最高境界表现在豁然开朗、洞察入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互相融化的状态之中。所以，“化境”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标准，而是钱氏心目中文学艺术与翻译的最高理想。翻译“化境”论的形成，与钱先生早年提出的“不隔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与钱先生对“信”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不隔”与“化境”的第一要件就是“信”。真正的“信”，在钱锺书眼中却并非一种亘古不变的标准，而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境界说是钱锺书文学翻译思想的主要特点，它将“信”、“不隔”与“化”串在了一起。

1934年，钱锺书在《学文》月刊上发表了《论不隔》，他借用了王国维的“不隔”说作为“好的翻译”和“好的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钱锺书说，“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严复《〈天演论〉绪例》所谓‘信达雅’的‘达’，翻译学里的‘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用语言文字，或其他媒介物来传给读者”（钱锺书 2002：111）。因此，“不隔”说涉及翻译以及文学创作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化的翻译；一是翻译化的艺术。在艺术化的翻译里，“不隔指的是与原文的风格不隔”，“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糊涂”（钱锺书 2002：114），因此，“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钱锺书 2002：113）。这种强调译作与原作之间绝对透明，绝对不隔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以“信”为本的翻译观念基本是一致的。钱先生在其后提出的“化境”说里，同样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锺书 1985：2）。由此看来，入化的翻译，也同样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和透明性。“信”成为“不隔”和“化”的第一要素，要达到“不隔”或者“化”的境界，首先必须得忠实于原文。

然而，从“信”“不隔”到“化境”，在钱先生看来并非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标准，而是要追求的理想境界。钱锺书指出，严复并不想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相反，在翻译《天演论》时，为了让译文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他并没有做到对原作的绝对忠实。正如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 1984：136）。要达到与原作百分之百的“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强调，“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什法师⁸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 1984：136）。译界历来诟病严氏没有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这恐怕是后人强解严意所致。钱先生对“信”的定义是“依宗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钱钟书 1979a：1101）。翻译的时候，得意忘言，这是钱锺书的理想境界。钱先生曾引江西先辈谈艺要旨，择吕东莱语：“学诗当识活法。活法者，规矩具备，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转引自周振甫、冀勤 2013：291）。只有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达到了翻译的最高境界。同样，钱先生提出好的翻译是“不隔”，也不是将“不隔”看成是一个标准，他认为“‘不隔’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钱钟书 2002：113-114）。“境界”说在钱锺书的“化境”中得到了延续与升华。正如钱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化境”是翻译的最高理想。

“化”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庄子·齐物论》中“物化”是指物我界限的消融，万物融合为一（庄周 2008：16）。《荀子·正名》有语：“……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况 2002：159）。在翻译中，“化”是指译作在原作基础上的“状变”而“实无别”，即流失的是无法保存的形式，保存的是内容和精华。与基于“信”的传统翻译观相比，“化”呈现了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特点——所以，“化境说”可以看作是“信”的一个变奏曲；不同的是钱先生虽然认为化境是翻译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绝对标准，因为彻底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钱先生曾用 17 世纪英国人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的比喻“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来解释“化境”——“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钱钟书 1985：2）。这种投胎转世出现在钱锺书评黄克孙译《鲁拜集》之中，“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 Fitzgerald 原译。Fitzgerald 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

此图片由台湾书林公司总经理苏正隆先生提供。

做翻译的时候字比句次、亦步亦趋，只为了追求与原文对应，这样做就只能是一只“死老鹰”；而尽量保持原文的意义，虽在形式或风格上有所欠缺，虽不是“活鹰”却也是只“活麻雀”。当然，如果既能不流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

味，那就是真正的“活鹰”，达到了“入化”的境界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少之又少，在钱锺书的眼中，黄译《鲁拜集》可算得上一例。

4.2 从“失本成译”到“讹”：译之本质

在“化境”论中，讹与译不可分割，讹是译之本质。“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锺书 1985：2）“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钱锺书 1985：3）。这就是“讹”，钱锺书指出，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有关“讹”的讨论，也并非钱先生首创，它至少可追溯至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的“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钱锺书在《管锥编》第四册《翻译术开宗明义》中对该文推崇备至，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并对“五失本”做了详细的探讨：

“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而安《鞞婆沙序》曰：“遂案本而传，不合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又《比丘大戒序》曰：“于是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真译者无可奈何之事。（钱锺书 1979b：1263-1264）

各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各国也有各自的文体风格。“钱先生并非不同意忠实的译作，他不同意的是那些为了忠实而过分拘泥于原文的译作。在钱锺书的理念中，“忠实”不是评判译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失”是一种常态，无失不成译，“失”乃翻译文本的固有属性。然而，虽然“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却不能因噎废食，不可译不等于不能译。有些文本不可译但是我们还是能译，之所以能译，那就是要在“讹”上面来做文章，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他在《翻译术开宗明义》一文中就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对于翻译的比喻：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塞万提斯谓“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叔本华谓“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伏尔泰谓翻译乃是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鸠摩罗什之“嚼饭与人”，赞宁之“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此外还有“葡萄酒之被水”“乳之投水”“驴蒙狮皮”“沸水煮过之杨梅”，

等等 (参见钱钟书 1984a: 28-31)。钱先生此处希望说明翻译的复杂性和翻译者所处的困境,但这并不等于承认翻译可以背叛原作,大胆自由地篡改原文。翻译之“讹”虽不可避免,然而译者仍要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尽量克服译之“讹”,向译之“化”无限靠拢。这才是钱先生论述的真谛所在。

按照钱先生的分析,“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有粗心大意而为之的;二、不负责任而为之的;三、不得已而为之的;四、有意而为之的。按照钱先生的观点,第一、二种“讹”是可以而且必须避免的,第三种“讹”之所以不得已是因为。为何?一来两国的语言、文化和习惯存在差异;二来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决定它不能像做文学研究一样去做——“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钱钟书 1985: 7);钱先生提到的第四种“讹”通常出现在天资雄厚的译者身上,比如林纾。“[林纾]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 1985: 5)。需要指出的是,这伴随第四种“讹”出现的译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常常是天才之代言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形当作普世的标准而推广之。而且,“讹”通常只出现在文学翻译之中,我们不能将其推广到一切的翻译范畴之中。这些恐怕是我们在学习钱钟书的文学翻译理论时应该注意的。

由于“讹”给翻译所带来了种种干预,如何辩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钱先生指出,一方面,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修辞学或者文章作法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思维和心智(参见钱钟书 1985: 5)。钱钟书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其能够辩证地看待“讹”——以前但凡提到译之“失本”时,都是持批评抑或惋惜无奈之否定态度。然而,钱先生却不同,他不但辩证地将“讹”分成可以避免的“讹”和无法避免的“讹”,而且看到了“讹”能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媒”和“诱”。

钱钟书一方面提出“化境”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又认为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钱钟书 1984c: 610)”,不同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本来就千差万别,要达到“化境”又谈何容易。然而,如果认真分析钱先生的“化境”观,分析他对“讹”做出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对译本的评价分为三种:等化、欠化、超化。“等化”就是钱先生所说的完全达到的化,也就是如他所说的既没有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的译作,这样的等化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欠化”是译本之常态,正如钱先生所说,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讹”又是不可避免的,完